

新发展理念与教育社会治理创新

——教育与社会学专场概览

2016年11月27日,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社科联主办,淮阴工学院承办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十届学术大会教育与社会学专场在淮安举行。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江苏省社会学学会会长宋林飞,中共淮安市委常委、宣传部、统战部部长陈涛,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会长丁晓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思斌,淮阴工学院党委书记章跃、校长李北群、省社科联副主席徐之顺等出席开幕式。来自高校、科研机构的20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展开研讨交流。

切实加强新发展理念的学理性研究

“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创新。”刘德海指出,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近年来江苏省社科理论界运用课题研究、学术研讨、智库论坛、决策咨询等多种渠道,围绕新发展理念与江苏建设,从多学科多领域开展理论探讨和决策咨询,推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要切实加强新发展理念的学理性研究,重点探讨新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贡献,新发展理念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家治理现代化等重大战略的内在关系,为新发展理念的学习研究和贯彻宣传提供学理支撑。

陈涛表示,经济发展新常态已成为鲜明背景和时代主题,纵深推进改革、落实“两聚一高”、全面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加快苏北振兴崛起,迫切需要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淮安市扎实推进地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新型智库建设,通过政策研究、课题调研、战略规划、项目评估等形式,在服务决策、推动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完善社会治理与保障的关键在于坚持共享发展

“各级政府应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将提升社会共享度作为增进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政策目标与手段。”淮阴工学院王正中谈到,研究显示,与个体特征和地区经济因素相比,社会共享对提升居民幸福感更为重要;社会距离、社会歧视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支持、制度保障与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均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收入水平高并不必然带来居民幸福感水平的同步提升。

农村居民养老是当前社会治理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南京农业大学姚兆余指出,农村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与个体人力资本和家庭养老资源有着一定的相关性。为了满足农村老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政府应加强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宣传,普及居家养老的基本知识;针对农村各类老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有针对性提供各

种专业化的养老服务；在充分考虑农村老人经济能力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居家养老服务收费标准。

针对失地老人面临的养老问题，南京理工大学王兰芳提出，可为早期被征地老人提供差异化福利津贴；建立普惠的社区医疗保障综合服务体系，对患大病重病的早期被征地老人提供适度医疗补贴，提供主要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与高龄老人的惠民养老服务。

以新发展理念指导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

大学和高等教育既是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治理不断完善的推动者。“要实现大学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依托大学内部的组织系统。”扬州大学青年学者鲁烨认为，大学教育系统的学术属性决定了针对大学的治理必须秉持学术导向，以学术思维方式去厘清大学治理“何以治、治以何、以何治”的基本问题，明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主体与界限，在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完善中实现治理能力的聚合提升。

中国矿业大学赵保全认为，发挥大学的能动作用推进社会道德治理、参与塑造社会伦理实体，有助于形成更加民主、自由的社会伦理关系和稳定和谐的社会伦理秩序，它能更好地发挥大学的道德教育功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提升公民的道德品质素养和道德行为，培育社会道德主体。

“在具体的政策制度方面，我国高校贫困生资助方面的公共政策存在广阔的改进空间。”淮阴工学院刘朝武指出，当前，高校扩招这一前置公共政策的失范效应明显，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中学杂费的绝对比重不断增加未被充分考虑，使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学费水平存在严重

的结构性矛盾。贫困生资助公共政策的时间滞延效应明显，其中政府责任明显缺失，而作为贫困生资助主渠道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还不够完善。同时，我国教育捐助制度缺失，贫困生资助的融资渠道偏窄。

面向社会治理实践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要完善社会治理，达成‘三社联动’系统的内部平衡，保障‘三社联动’系统的长久良性运作，必须在教育端解决社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困境。”淮阴工学院闻瑶提出。

“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为例，这是一个实践性较强的专业，但目前无论是本科还是社会工作硕士（MSW），都普遍存在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实务能力培养薄弱的问题。”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刘正峰指出，问题的出现一方面与实习资源短缺有关，另一方面，在社会工作较为繁荣、实习资源相对丰富的上海和广州，这一问题也比较突出。应当针对性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借鉴英美高校社工人才实务能力培养的经验，促进我国社工专业的健康发展和人才培养。

“实现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需要一系列行动条件。”苏州大学崔玉平认为，大学生群体需要自我唤醒，成为创新创业教育行动的推动者和受益主体；高校及教师必须发挥好实施主体的作用，营造创新创业文化，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必须适应大学生成长和成才的需要，由具有创新创业实践经历或经验的教师主导；通过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家庭联动，共同为大学生营造健康宽松的创新创业外部环境。

教育与社会学专场主题发言专家观点:

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创新的基础与可能途径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王思斌)

当前我国社会学的研究创新面临困境。一方面,社会学的学术研究侧重于对西方理论的学习,而对本土理论的建构比较少;另一方面,社会学的现实解释集中于对局部社会现象的下中层理论概括,多样化的社会事实、各自为战的研究实践导致了研究成果的重复性和碎片化。学术研究上的专业化表述和对现实问题的实质性指认形成了两个方向的力量,导致学术研究与现实问题解决之间存在张力。

当前我国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研究创新必须以宏观社会变迁的现实和趋势为背景,将学术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紧密结合,以客观反映变迁中的社会过程和社会结构,并从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和新的资料三个维度来进行。社会学研究创新的基础是中国社会的异质性和对这种异质性的认识及描述,我们要学会逐步从局部的、概念补充式的有限创新走向整体的、独创性的完全创新。以“差序格局”为例,其创新性就在于它是在对社会现象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和新理论,反映了中国现实,可以用来指导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社会服务实践,迫切需要能够反映现实需要的相关理论及服务模式,而中国目前在社会工作价值观、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和专业化队伍等方面都不够成熟,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亟需创新。由于社会工作理论(模式)创新的困难主要体现在政治与服务关系的处理和嵌入型发展等方面,因此其可能的创新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专业服务和基层治理创新中寻找结合点;二是在解决现实问题与

发展之间(服务对象发展、社区发展、社会发展),特别是,在本土文化资源上寻找结合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现代化(江苏省政府参事室原主任、教授 宋林飞)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包括三个阶段,即初步现代化、基本现代化、全面现代化。这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初步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实现基本现代化,达到主要发达国家水平就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由此,我们说推进中国现代化三大阶段的顺利进行与无缝对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与历史使命。

今天,我国的现代化已经在路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阶段。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总是首先在一定的区域取得进展和突破,继而影响或带动周边地区的现代化。因此,有条件的地方应率先迈开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步伐,也就成为历史赋予先行地区的光荣使命。以江苏省为例,就是要紧紧围绕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光荣使命,努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

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这其中,最艰巨的任务是消除贫困,特别是消除农村贫困。我们认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难点与重点。而要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于找准、补齐农村贫困这个短板。通过加快“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实施异地扶贫搬迁移民政策、关爱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等措施的落实,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参与,

使全社会形成扶贫合力。

提升省域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的基本路径（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教授 丁晓昌）

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高等教育治理能力，必须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以构建政府、高校、社会新型关系为导向，以推进管、办、评分离为切入点，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政府宏观管理、高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

政府层面，要加强省级统筹，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担负起承上启下的统筹责任，推动职能转变，改革治理方式，切实提升“管”的能力，当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领航员、教育体系的建构人、教育标准的制定方、提供条件的保障者。

高校层面，要完善治理结构，依法依规自主办学。重点处理好上位约束与自主办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内部治理与外部协作的关系。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依法依规办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坚持学术本位，完善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相对分离，加强学术制度建设，从而完善以章程为依据的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实现内外协作共治。

社会层面，要培育专业机构，广泛参与监督评价。推动专业性和非营利性教育评价机构参与监督评价，通过中介机构“再组织化”“再专业化”“再服务化”，实现组织重构、能力提升和行业自律。

发展性：我国高校教师评价的政策转向（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教授 操太圣）

目前，我国高校教师考核评价机制存在着道

德评价形同虚设、评价目的偏重选拔性评价而忽视发展性评价、重科研轻教学、对青年教师重使用轻发展、缺乏良好的评价文化等问题。然而，要落实高校教师考核评价机制的政策实施，其路径应当是：确立发展性评价理念，重塑教师考核评价目标定位；实行以发展性评价为主、奖惩性考核为辅的考核评价模式，将发展性评价贯穿于教师管理的始终，使推动科研工作联合攻关成为常态。此外，学校还应将工作重点放在服务于教师的创造性劳动之中，并通过签订“创造性合同”来推进“评价制度”的改革。

有学者在研究教学与学术的关系时指出：“学术”包括发现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因此，高校应将教师专业发展纳入考核评价体系，调整完善教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确立教学学术理念，加强教师教学基本功训练和信息技术能力培训；要建立考核评价结果分级反馈机制，建立教师考核评价的校、院（系）分级管理体系，维护教师权利，注重与教师的及时沟通和反馈，科学分析教师在考核评价中体现出来的优势与不足，根据教师现有表现与职业发展目标的差距以及影响教师职业发展的因素，制订教师培养培训计划，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帮助和指引，以促进全体教师可持续发展；积极推进发展性评价改革，支持高校建立教师发展中心，完善教师培训和专业发展机制，加大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与经费投入，通过引领示范，以点带面，逐步全面推开高校教师发展性评价改革。

协同：院校转型理念与路径（淮阴工学院校长、教授 李北群）

作为地方本科院校，如何顺应高等教育发展

规律和现实需求，是当前转型发展所面临的难题。地方本科院校要不要转型？为何转型？如何转型是我们亟待思考和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高校转型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如何转型发展还众说纷纭。对于是否要转型、谁需要转型、如何转型等问题没有统一的认知。二是中央及省市地方政府三方责任的厘清。即中央政府引导转型、提高门槛、加大竞争；省级政府规划引领、分类管理、评价引导；地方政府利益牵引、行政干预、推动合并等。三是社会诉求多样多元，形成了大众追求大学梦；企业需要适用人才；学校师生在“漂移理论”影响下也追求向上“漂移”、主题“漂移”和学术“漂移”。此外，在高等教育转型过程中，还

存在缺失有效路径、模式资源等多种问题。

针对高校转型发展中困境与缺失，我们地方院校也进行了实践与探索，提出了协同发展的理念：主体多元开放、资源共建共享、发展路径创新、学科专业协调，以协同发展理念组建校与校、校与政、校与企、校与所、校政企所等多元协同主体，通过协同创新，破解高校转型之困。由此，我们践行了推进体制创新，打破体制壁垒；推进机制创新，摆脱机制束缚；推进方法创新，开辟多元路径等协同理念与路径的探索，并通过成立协同体和可视化平台，让企业和境外技术专家直接授课等协同平台，促进了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推进了学校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着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学会专场综述

2016年12月30日，江苏省社科界第十届学术大会学会专场在南京举行。来自江苏省、市、县三级学会的获奖论文代表与省级社科类学会负责人150多人，围绕“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治理创新”的主题展开研讨。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副主席徐之顺等出席会议。10位专家作了交流发言。

落实党委主体责任与创新社会治理

常州市人大工作研究会章丽华指出：一个成熟的社会，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三种力量基本均衡的社会，三者共同构成稳定社会的“铁三角”。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正在从经济领域向政治

和社会领域推进，而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的突出任务就是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大力培育社会组织，不断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从党委政府“撑船”向党委政府“掌舵”，“依靠群众打天下”向“依靠群众治天下”转变，努力构建党政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南京市委党校张华民教授指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提出的新要求，南京市各级党组织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方面做出努力并取得成绩。但在现实中，落实主体责任越往基层越困难。存在的问题一是重经济、轻党建，缺乏先进模范意识，主体

责任和监督责任区分不清；二是不能严格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选人用人尊崇个人喜好，发展党员不能严格把关；三是作风建设中不作为、懒作为、怠作为等现象；四是反腐倡廉建设规范意识差，人情关系重，群众认同度不高。针对上述问题，一要加强责任意识教育，强化一把手的责任担当；二要抓好责任落实，把党建作为重大项目认真加以落实；三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包括民主监督委员会制度、激励机制等。

经济社会变革与创新社会治理

江苏理工学院刘东皇副教授认为，我国经济结构走向“优化再平衡”面临着供给侧的系列约束，包括：经济赶超发展战略、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和不合理的政策支撑体系等。从创新社会治理的视角深化供给侧改革，应坚持“均衡协调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政策支撑体系”三位一体、三管齐下，以促进新生动力的成长壮大，推进经济结构优化。

南京邮电大学梁德友教授指出：新社会运动理论和底层社会理论，是西方学界研究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主要范式。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弱势群体的“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认知还处在“经验堆积”的感性阶段。在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践中，我们可以适当借鉴有益的理论成果，但必须立足我国实际，推动相关研究从感性向理性的进一步深化。

省政府办公厅金世斌认为：乡镇政府直接面向基层、面向广大人民群众，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最低层次的地方政权组织，是落实国家方针政策的最终执行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调整。从“社改乡”“乡政村治”“撤并乡镇”，到县乡综

合改革试点、乡镇管理体制创新，再到农村综合改革、“乡财县管”“强镇扩权”。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应汲取多轮改革的成功经验，在理顺乡镇体制、规范机构设置、精简人员编制、提高行政效能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社区多样化发展与创新社会治理

省社科院张春龙研究员认为：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商品房社区、老城市社区、拆迁安置社区、纯农社区、农民集中居住社区等多种类型的社区，还有一些超大型楼盘构成的社区。由此带来社会问题、社区治理问题重重。我们只能从社区类型多样化、发展阶段不统一等实际出发，针对不同类型社区，尤其是规模大型化、功能综合化的大型社区治理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开展辩证施治。

河海大学孙其昂教授指出：面对城市社区生活中出现的复杂矛盾，寻找有效的治理模式成为基层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城市社区治理并不是单向度的线性链条，而是多主体多层次反复协调与整合，“互构型”治理，是研究城市社区治理机制的新视角。所谓“互构型”治理，是指社区中的制度主体与生活主体互构共变，形成相互适应的社区治理模式。“互构型”社区治理视角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保障和改善民生与创新社会治理

南京政治学院卢继元教授认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涵和根本目的所在。在这方面，我们党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始终坚持的是人民群众利益至上原则，彰显的是创新社会治理的主旨，起到了不断适应形势发展变化，

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

南京市卫生局胡晓翔认为，人最基本的平等在于生存权的平等，健康权是生存权最核心的部分。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必须高度关注人民群众的生存权与健康权。人在自然能力上是不平等的，但可以凭籍权利和约定来实现平等。在这些“权利”“约定”中，卫生保障法律体系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能使得自然能力千差万别的社会成员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权利，赢得最基本的人格尊严，这是社会最根本的生命伦理底线。

省委党校倪洪兰教授认为：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的健康发展是整个社会肌体健康有序运行的微观基础。打造健康中国，最基础的就是打造健康家庭。在现实社会治理实践特别是推进基层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进程中，

我们虽然强调了公民个体的民主参与，却忽略了家庭作为治理主体的作用。日益攀升的离婚率等家庭问题与变革中的诸多社会问题纵横交错，严重制约了家庭作为基层治理主体的功能发挥。因此，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必须关注家庭维度，高度重视健康家庭建设。这一方面有助于家庭问题的解决，使家庭成长为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社会力量；另一方面，重视家庭参与，有助于增强社区认同感与基层社会的凝聚力，从而走出基层治理的主体困境。

本次学术专场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会部承办。在入选学术专场的应征论文中，共评出获奖论文92篇，其中一等奖34篇、二等奖58篇。

（省委党校副教授吴青熹）

融入长三角城市群 增创苏中发展新优势

——苏中区域专场概览

2016年11月16日，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十届学术大会苏中区域专场在南通举行。江苏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施建中，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保刚健，南通市委宣传部分副部长黄正平等出席开幕式。南通市社科联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爱民主持开幕式。来自南京、扬州、泰州、南通等地近百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融入长三角城市群 增创苏中发展新优势”的会议主

题展开研讨。

会议研讨分专家主旨演讲和交流发言两个阶段进行。在主旨演讲阶段，《群众》杂志社副总编李程骅、南通大学党委书记成长春、扬州大学苏中发展研究院院长陆建飞分别做了题为《扬子江城市群与苏中功能地位的战略提升》《长三角城市群与南通经济转型升级》《苏中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思考》的报告。在交流发言阶段，6位论文作者代表发言，南通大学副校长蒋乃华作专家

点评。

跨江融合发展的良好机遇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的实施为苏中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徐之顺在讲话中表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将南通、扬州、泰州全部入围Ⅱ型大城市，说明苏中三市的发展基础和发展水平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这对于苏中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鞭策。”南通职业大学陆颢认为，未来15年苏中三市在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国家大战略中抢抓机遇，以创新驱动将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对实现新一轮“苏中跨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泰州被《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列为长三角城市群Ⅱ型大城市，要抓住良好机遇、聚集关键资源、关键要素、关键项目、关键元素，建设医药名城、港口名城、文化名城、生态名城。”泰州市委党校景云祥谈到。

交通对长三角一体化和苏中融入长三角具有基础作用，互联互通的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是苏中深度融入长三角的有力支撑。陆颢认为，从地理经济学的角度解释，苏中经济地位的变化，可谓兴也交通、衰也交通。“审视当前苏中地区人们对交通的认识与重视程度，可以看出重视南北线、忽略东西线的倾向，各方面努力做的就是南北线过长江。”泰州市人民检察院邹云翔还进一步指出：“行政区划应该成为经济融通、交通互通的推动者，而不是阻碍者”。

一体化协同发展是努力方向

增创苏中区域发展优势的重要路径是协同、合作、一体化。与会学者认为，苏中三市的发展一定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打破自然和人为的阻碍，按照经济区域内部的联系实

现更高层次的协同。蒋乃华认为，区域经济发展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产业，没有产业，就没有平台；第二是扩散效应，港口、生态等都是扩大城市影响力的重要支持；第三是协同，制度协同会引起行为改变。“协同既包括城乡之间的协同、也包括跨江协同。”他认为，提出“江苏省内扬子江城乡群”这一概念，就是要建设锡常泰、宁镇扬、沪苏通都市圈，打破长江阻隔，实现苏南和苏北在产业、文化、语言、交通等方面拉近，实现文化融合、经济协同。

泰州市人民检察院邹云翔同样认为，谈论苏中融入到长三角城市群而实现发展这一战略，首先要讨论的是如何激活内部的生命力，使历史上整体发展的苏中，避免因行政管理需要而被行政区划过分地牵制。

“城市群内合作呈现次第提升的三个层次：基础层次是城市间的布局合作，注重城市布局与交通联系；中间层次是生产中的要素合作，注重产业协同、错位竞争；高级层次是治理中的机制同构，注重机制创新，制度协同。”景云祥表示。

城乡一体是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融合发展、跨跃发展的必然选择，推动苏中地区城乡一体化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普遍认同。扬州大学张荣天提出，扬州市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显示出城乡产业发展不均衡、乡村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匮乏，户籍与土地制度不合理等问题。“城乡一体化是个老问题，根源在于市场不统一，土地不可以自由转换，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劳保等不统一，不能共享。打破城乡樊篱，还要克服城乡文化差异，解决农民不愿进城等问题。”蒋乃华表示。

遵循经济规律 发展新兴产业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提质增

效、转型升级具有极端重要性，同时也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与会学者表示，传统型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创新型集约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包括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与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两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不确定性、需要融资体制的改革和支持，需要网络化的构建，要有创业创新的环境促进企业家更好地投资。

南通市委党校李汝、南通市统计局励明在提交会议的文章中提出，发展新兴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提升增效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路径依赖往往使得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维持一定的惯性，经济提质增效是一个相对漫长和曲折的过程、与创新相辅相成，但创新的实现并不容易。因此经济提质增效是一个重塑经济发展新模式的过程，需要相当长的适应期和调整期以及相应体制、机制的重构期。

扬州职业大学刘正良提出，扬州战略性新兴产业曾经过多次调整，因为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未来应突出培育重点，协调发展扬州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成果转化能力；完善体制机制，扩大应用示范，改善产业质态；推进金融服务提升，构筑人才高地。

会议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社科联主办，南通市社科联、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承办，扬州市、泰州市社科联协办。会议共评选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术性与对策应用性相结合、有较强实践指导意义的优秀论文43篇，其中一等奖6篇，二等奖12篇，三等奖25篇。

苏中区域专场主题发言专家观点：

扬子江城市群与苏中功能地位的战略提升 (《群众》杂志社副总编 李程骅)

在落实长三角城市群规划过程中，江苏应以扬子江城市群建设提升苏中的战略地位，通过跨江融合发展促进沿江地区的要素集聚、人员流动，力争把苏(州)(南)通打造成对接上海这个龙头新的一极。过去我们多强调陆海统筹、江海联动，现在更要重视跨界融合，在国家战略如“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建设和长三角城市群建设中，实现融入，尽快缩小已有的差距。在城市群整体发展的空间格局之下，苏南苏中区域的概念已没有必要再分得过于清晰，未来发展应该加速融合，逐渐淡化苏南和苏中这种概念。

扬子江城市群的规划要强化生态观念，在生态优先的前提下实现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靠创新和产业升级。在扬子江城市群的规划中首先要解决产业升级这一问题。产业升级要发挥市场在资源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资源效益的最优化最大化，政府做的是做好规划、确定好城市群的发展定位。

扬子江城市群的规划要做到统筹规划，构建立体交通网络。苏中地区的北沿江主动脉与苏南地区的江南干道互为补充，形成环状交通网络、为区域发展提供均衡化支撑。第二，要突出中心城市的带动功能，创新驱动城市群多层级联动发展，借力多个发展战略的叠加效应、将其变为多重增长机制，打造沿海增长极。第三，要全力提升苏中地区的国际竞争力，依托现有的先进制造业，通过整体服务能力的提升积极探索产业升级转型的联动机制，打造国际制造业龙头、提升国际竞争力。第

四，要以绿色发展降低生产负荷，打造长江经济带示范区。绿色城镇带、绿色城市带在北沿江地区最有可能实现。第五，以良好的公共服务吸引人才。通过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实现人才要素配置的合理化，吸引人才主动流入苏中地区。

南通应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大有作为 (南通大学党委书记 成长春)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科学谋划中国经济新布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发展势头强劲、区位优势独特的南通，在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中，要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部署和江苏实施方案要求，结合地区发展实际，从整个长江流域范围统筹考量，善于借势，注重对接，努力抢占先机。

第一，把保护长江生态环境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一是要优化生态生产生活空间。二是要严格治理各类污染。三是要强化生态系统保护和生态修复。四是要合理利用长江资源。节约利用水资源、集约利用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岸线和航道等资源。

第二，促进各种交通运输方式衔接顺畅。公、铁、水、空各自发展得再快再好，做不到布局合理、衔接顺畅，就谈不上“立体式”，形不成整体效能。“十三五”期间，南通在集中力量推进便捷畅通高铁网络建设的同时，要加强铁路、公路、水路、机场之间衔接，大力发展综合交通枢纽和多式联运，努力实现客运“零距离换乘”和货运“无缝化衔接”，有力促进南通交通转型。

第三，努力提升南通中心城市在扬子江城

市群中的地位与作用。按照“经济中心、交通枢纽、花园城市、创新之都”的城市发展定位，在提升沪苏通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水平的同时，注重提升南通中心城市在通泰盐都市圈中的引领带动能力。对于通泰盐都市圈，要进一步提高南通中心城市在该都市圈中的首位度，增强南通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功能，高起点建设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推动三地江海港口资源高效整合，促进长三角城市群沿海发展带，加快形成以上海为龙头、以宁波都市圈和通泰盐都市圈为南北两翼的协调性均衡发展格局。

第四，加快实施“3+3+N”产业发展战略。三大支柱产业为船舶海工、高端纺织、电子信息；三大新兴产业为智能装备、新材料、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N则是指符合产业发展导向、有利于发挥南通自身优势的产业。这一产业发展战略不仅是南通的理性与现实选择，而且与《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以及《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方案》中打造工业新优势、优化产业布局中重点部署较为契合。

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加快苏中农业现代化进程 (扬州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 陆建飞)

苏中的南通、泰州和扬州三市地处江苏省中部、江淮之间，在江苏省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中担负着承接苏南、辐射苏北的重任。“十三五”时期，是苏中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对照江苏省农业现代化目标要求，时间紧迫、任务艰巨，迫切需要科学谋划、深化改革、强势推进。

当前长三角城市群的建设对苏中农业现代

化提出了新要求：一是要在新的高度上科学认识现代农业，二是要充分发挥现代农业的多功能性，三是要探索长三角城市群加快建设背景下的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

“十三五”期间，苏中要认真贯彻和落实“五大”发展新理念，按照“四化”同步的总要求，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为主线，以实施农业现代化工程为总抓手，以发展“技术密集、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高效生态农业为目标，努力实现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四化同步”。

推进苏中现代农业发展，要按照循序渐进、分类实施的原则导向，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基本方针，坚持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多予少取放活等方针，统筹城乡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发展、产业发展、就业及社保、市场体系、土地制度等。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为农民提供周到便捷的社会化服务，以“大服务”来引领和带动苏中地区的“小农”走上农业现代化的轨道。

一带一路战略与苏北发展路径创新

——苏北区域学术专场综述

2016年11月17-18日，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十届学术大会苏北区域学术专场在宿迁举行。会议以“一带一路战略与苏北发展路径创新”为主题，论文作者120余人参会。江苏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沈和，宿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正兰，苏北五市市委宣传部及市社科联领导出席会议。沈和等6位专家作主旨发言，徐州工程学院邵川副教授等5位论文作者作会议交流发言。

把握苏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机遇和挑战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江苏经济社会形态的主要特征之一。江苏要实现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苏北的发展仍然是短板。苏北五市在建

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应抢抓机遇，利用“一带一路”交汇点的区域特点，积极主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江苏省社科院沿海沿桥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古龙高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直接机遇，包括外经工作、外资工作、外贸工作等“走出去”的机遇，平台建设、产业园区建设、可以合作争取建设自贸区等“引进来”的机遇。

沈和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苏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与江苏全省发展水平特别是与苏南发展水平比，苏北发展“短板”现象比较明显，主要有八个短板：经济规模上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财政实力偏弱；产业结构上，三次产业结构层次偏低，高新技术产业规模

偏小；对外开放上，进出口贸易总量偏小，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规模不大；市场主体上，市场主体数量质量差距明显；科教人才上，研发经费投入占比较低，科技人才支撑力度不强，高等教育资源不丰富；基础设施上，交通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仍待加强；城市发展上，城镇化进程落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不够完善；富裕程度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较大，居民消费支出水平不高。

徐之顺强调，在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苏北发展要结合“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的实际，突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问题研究，如：如何更好地发挥连云港、徐州的节点城市作用，加快推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苏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如何切实推进民心相通，弘扬丝路精神，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开展人文合作等等。

赵正兰希望与会学者广泛讨论，凝聚苏北五市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及苏北创新发展的共识，并使之成为苏北创新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推进苏北五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协作

盐城师范学院刘吉双教授提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苏沿海地区应努力实现一体化发展，要推进港口建设一体化、交通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城市空间一体化、旅游一体化。

古龙高认为，整体联动是“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加快苏北发展的新对策。苏北五市可从推动市域层面联动、产业整体联动、以共建共用核心资源、合理的区域分工、实施联通等来促进整体联动。

宿迁学院杨殿闯提出，苏北应建立市级层

面沟通协调机制策应国家战略导向，推进苏北及周边地区一体化发展；应注重提高经济发展集约化水平，发挥比较优势；发挥企业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主力军作用。

发挥各自优势，积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苏北五市各有不同的发展优势和特点，与会专家结合五市的发展目标、发展现状及区域特点，论述了各市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优势、意义及举措。

徐州市委党校张凯认为，徐州的经济总量由小向大转变、产业层次由低向高转变、城市带动力由弱向强转变、人民生活水平由小康向富裕转变是未来发展的方向。邵川提出，苏北城镇化发展应以优化提升东陇海城市群、推动城镇化建设为主要目标，从合理规划城镇空间格局、大力发展中心城市、带动中小城市，优化产业结构、强化产业支撑、增加就业岗位，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增强人口及距离，拓宽资金来源等方面多措并举，推动城镇化有序发展。

淮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黄克清提出，“十三五”时期的淮安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基本确立苏北重要中心城市地位的决战期，抢占区域竞争制高点的关键期。拓展对外发展空间是淮安融入大战略的必然路径。在“东融西拓、南联北接”工作中，要向东全域融入江苏沿海开发，向西大力拓展淮河经济带，向北对接沿东陇海线经济带发展，向南联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民建淮安市委庞进亮提出，淮安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应加快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推进实施产能合作项目、加快全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加快营造良好发展环

境。

盐城市政府研究室成星群提出, 响应“一带一路”, 应注重科技引领跨越。他提出, 盐城环保科技城的超常规、追赶型发展实践具体表现为: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 明确目标定位; 二是延展产业链条, 培育产业集群; 三是优化政策环境, 完善支撑体系; 四是调动会展激情, 增强发展动力。这些实践对加快苏北全面小康建设步伐, 特别是大力发展特色园区经济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连云港市委党校王洋提出, 连云港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 与中亚国家在徐圩新区共建商贸集聚区, 会产生消费带动效应、成本节约效应、区位品牌效应。中亚商贸区集聚区的建设着眼于: 夯实基础, 推进“三区”建设; 汇聚要素, 完善四个关联点; 搭建平台, 发挥丝路国家展贸中心的五大功能。

宿迁学院李明建提出, 连云港、徐州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规定的重要节点城市。宿迁则是连云港、徐州两大节点城市的紧密联系区域, 是连云港、徐州两城市的中心连接点。宿迁建市20年取得了诸多成绩, 改革创新精神的不断培育、产业转型升级的加快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力推进都对宿迁对接并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宿迁的创新发展应该把握机遇, 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加强外向型经济建设; 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会议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社科联主办, 宿迁市社科联、宿迁市委党校承办, 徐州市社科联、淮安市社科联、盐城市社科联、连云港市社科联协办。会议收到参会论文195篇, 经大会学术委员会评审, 共评出一等奖论

文10篇、二等奖论文20篇、三等奖论文40篇。

(宿迁学院李明建)

苏北区域专场主题发言专家观点: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与苏北发展路径创新 (江苏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沈和)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 苏北振兴的主要路径是把握趋势、突出重点、综合施策、换道超车。

苏北地区应打造经济增长极。即要重点推进连云港“一带一路”交汇点和徐州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重要节点城市建设; 依托国际交通大通道, 推进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中哈物流中转基地、上合组织成员国出海基地等重点项目建设。

苏北地区应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当前苏北面临的最大问题, 仍然是发展不充分, 突出体现在产业层次不高、竞争力不强。要紧紧抓住发展第一要务不放松, 按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把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作为主攻方向, 在江苏省“一中心”“一基地”建设中找准定位, 深入推进两化融合发展, 加快构建以现代农业为基础、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具有区域特色和较强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推动产业机构加快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

苏北地区应努力提高双向开放水平。“一带一路”带动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发, 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其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号召方案也体现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 在地缘拓展上的睿智与矜持。对苏北而言, 一是有利于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 二是有利于增强苏北发展动力、活力; 三是有利于加快苏北经济结构调整; 四是有利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苏北地区应着力做强新型市场主体。政府要做创业者的三大支柱：一是创业基础设施的支柱，让创业者“处处可创业”；二是创业服务的支柱，让创业者“时时能创业”；三是创业安全的支柱，让创业者“人人敢创业”。

徐州对接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对策(徐州市委党校 张凯)

徐州对接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面临诸多机遇：“一带一路”重构徐州发展新格局，提升徐州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推动徐州更多企业“走出去”，催生优化徐州合作平台与载体，有利于徐州与周边融合发展。徐州对接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也面临诸多问题：徐州周边港口经济对徐州带动力较弱；徐连飞地经济合作模式处在探索阶段；徐州与周边缺乏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领导机构；徐州与周边区域联动发展的内生驱动力不足、保障机制不健全。

徐州对接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对策如下：一是抓住“六大”发展机遇，提高徐州中心城市首位度；二是立足“一带一路”全局，优化徐州与周边联动空间布局；三是突出互联互通建设优势，提升徐州与沿线区域立体通道功能；四是积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徐州产业链向高端跃升。当前要立足徐州传统工业的优势，发挥港口、区位、土地、科技资源优势，进一步加大国际产业合作，整合国内外资源，打造国际生产网络，培养中国企业主导的国际产业链；五是实施海陆统筹开发战略，密切徐州与沿线区域的联系和合作；六是完善跨区域的协调机制，积极搭建公用服务和技术平台；七是打破区域内行政藩篱，推进徐

州与沿线区域市场一体化；八是推进政策体制机制创新，优化徐州对外开放合作的软环境；九是以加快园区建设为途径，着力构建现代产业集群体系；十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强对中西部腹地的服务；最后是开发与保护并重，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融入国家大战略 拓展发展新空间(淮安市发展改革委 黄克清)

苏北地区是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江苏沿海大开发国家战略叠加区域，但也面临本地要素流失、外来要素难聚等挑战，唯有融入大战略、拓展新空间，才能继续保持经济社会平稳持续发展。就淮安而言，融入大战略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融入大战略的必要条件。淮安处于苏北地理几何中心位置，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必须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十三五”时期，将构建连接南北的高铁网、快速畅达的航空网、通江达海的水运网、优势互补的经贸网。

推进主导产业错位布局是融入大战略的必然选择。苏北地区工业发展已进入快车道，淮安将积极推进主导产业错位布局，实现苏北地区协同发展、错位发展、联动发展。“十三五”时期，淮安将打造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构筑苏北现代服务业高地、建设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加强政府空间管控能力是融入大战略的必然要求。国家重大战略涉及区域广、重大项目多、发展轴线长，要求苏北各市统筹考虑经济社会活动总量和空间需求。淮安作为国家“多规合一”试点市，将探索构建市县空间规划体

系,不断加强政府空间管控能力。

“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苏陆海统筹发展路径的选择(盐城师范学院 刘吉双)

江苏省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其中,连云港市、南通市和盐城市是江苏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节点城市。“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要统筹江苏陆海资源配置、陆海产业培育、陆海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陆海生态环保,高标准推进江苏陆海统筹发展,为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开拓更广阔的空间。

首先要积极构建新型集团化港务集团,提升江苏沿海港口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龙头”作用。江苏要适时组建江苏新型港务集团,着眼“一带一路”战略目标,出台江苏沿海港口建设新的扶持政策,到2020年把江苏港口打造成横贯东中西、对接东北亚、融入“一带一路”我国中部重要出海通道。

其次要进一步明确江苏沿海各港口发展定位,提高港口集约化、专业化水平。要加强“十三五”规划引领,以特色明显、错位发展、分工协作为原则,统筹协调江苏各港口的发展定位,促进江苏港口专业化、集约化发展。

再次要探索形成江苏沿海“数字化”城市群,打造“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在不改变行政区划前提下,充分发挥大数据功能,尽快实现江苏沿海城市区域内户籍、社保、医疗、交通、信用、旅游、产业一体化进程,打造沿海“数字化”城镇群。与苏南以及上海的“数字化”对接,推动长三角北翼加快深度融入上海经济圈,并探索与新亚新欧各国经济贸易数字对接,融入“数字化”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进程中。

最后要放大江苏沿海产业园区“拉动”效应,加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载体建设。要促进港口产业园区集聚、集约发展。按照“务实、高效、便捷、现代”的原则,推动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国家级高新技术区、国家级经济可持续发展区和国家保税区向港口区集中,赋予产业园区在“人、财、物、土地”等生产要素上更大的使用权利,为产业园区发展拓展新的空间。

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实现苏北跨越发展(江苏省社科院连云港分院 古龙高)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加快苏北发展的新对策有以下几点:一是政企联动,规划先行,做好顶层设计;坚持市场导向、企业主体的原则,共建共用海外企业,形成项目示范效应,为苏北“走出去”打开新空间。二是政策拉动,提升政策能级,共同争取自由港政策;强化政策引导,做好政策对接,形成共建共享、合作开发新模式,实现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和联动发展。三是创新驱动,四是市域层面、产业层面整体联动,以共建共用核心资源推动整体联动,以实施联通助推区域联动,实现苏北地区跨越发展。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苏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与路径(宿迁学院 杨殿闯)

近年来,苏北地区在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不论与苏南、苏中地区相比,还是苏北五市内部,在产业结构、人均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进出口等核心指标的差距明显缩小。

但也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区域内部有效协调机制短缺，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在地级市层面，都还没有建立相应的协调机构或机制；二是地区发展战略覆盖不均衡，不仅表现在苏北五市之间的差异，更表现在缺少一个将苏北五市作为核心区全面覆盖的统一战略；三是与苏南地区相比，苏北区域经济规模与质量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苏北

地区应强化区域协调和错位发展的政策理念，建立苏北地区市级层面沟通协调机制；以冲刺国家战略为导向，加快推进淮海经济区、淮河生态经济带规划建设，进一步探索苏北及周边地区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各市比较优势和地方企业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主力军作用；组建区域智库发展联盟，充分发挥地方智库服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助推区域深度合作。

提升城市品位 促进精明增长

——苏南区域专场概览

2016年11月29日，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社科联主办，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市社科联、苏州市社科联、无锡市社科联、常州市社科联、镇江市社科联和南京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学会承办，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十届学术大会苏南区域专场暨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十一届学术年会在南京举行。来自全省社科界的160余位学者与会，围绕“提升城市品位，促进精明增长”的主题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

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所所长张鸿雁、南京古都学会会长俞明、苏州科技大学副教授单鹏飞、无锡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苗春阳、常州工学院党委书记王建明、镇江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张志耕等作大会主旨报告。

城市发展理念的重大创新

“城市是国家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是创新要素集聚与发展的关键载体。‘城市品位’和‘精明增长’理念的提出，正是对传统城市发展理念的一次创新，即不再追求城市GDP粗放型增长，而是力求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更多地造福人民。”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指出，提升城市品位，促进精明增长，既是当前我国城市转型发展的重大实践问题，也是社科理论界需要重点关注、致力研究、做好服务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刘德海强调，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加强学理性研究，科学把握“城市品位”和“精明增长”

这一城市发展新理念的丰富内涵、理论意义和实践要求,重点探讨“城市品位”与城市历史文化、特色风貌、自然景观、精神气质之间的逻辑关系,“精明增长”和传统城市粗放式增长的区别,“精明增长”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机结合的路径等,努力为提升城市品位、促进精明增长提供学理支撑。

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德生提出,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不仅需要高效的生产模式、便捷的公共设施,也需要青山绿水和精神家园。如何让自然要素、人文要素和空间要素达成和谐统一,提升城市品位?他认为,在信息化时代,推动全民参与城市建设,促进精明增长,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智力支持。

在科学保护利用中彰显城市品位

城市品位的构建应将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进行完美融合,苏南五市拥有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但是在近年来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面临着特色风貌保护与生活方式、产业更新相冲突的困境。

目前,我国城市发展普遍存在“重物质、轻文化,重局部、轻整体,重保护、轻延续”的问题。南京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常务理事苏玲认为,任何一座城市在塑造自己的空间品质和文化环境时,都应该继承历史、立足当代、展望未来,都需要在自己城市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只有这样才能使城市形象脱颖而出。

针对苏南地区分布众多的历史文化小镇,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朱逸宁谈到,很多小城镇蕴藏着丰厚的文化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藏书楼”,集聚着城市的“乡愁”。我们不能把大城市当成是现代文明的唯一选择,要谨慎对待小镇的开发,避免过度开发、商业化和同质

化。小镇开发既要兼顾经济,又不能破坏小镇自身的特色。

苏州科技大学周静认为,要抓住特色小镇的两大核心——特色产业和特色风貌,在此基础上打造内涵式创新驱动平台,同时还应因地制宜,结合城市自身的特点,整合现有资源,并创造条件进一步集聚高端要素。

以产业结构优化促进城市精明增长

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有一个动态的匹配过程,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节奏协调一致,才能取得共同发展。新阶段城镇化发展应提倡“以内涵增长为主、重视质量提高集约发展”,通过功能混合的方式促进城市生产生活功能的融合,提升城市空间的利用效率;通过紧凑布局的方式,提升生活便利度以及社区的活力。

“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是产业发展的载体。城市缺乏产业支撑,即使再漂亮,也只是‘空城’;产业没有城市依托,即使再高端,也只能‘空转’。推进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当前已成为国内外先进地区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战略选择。”无锡市滨湖区委办公室副主任董盛雄指出,要突出都市型产业发展,加速以产促城;突出功能性配套完善,推动空间结构的优化、综合片区的优化、服务配套的优化,加速以城兴产。城市发展要以产业作支撑,防止城市“空心化”;产业发展要以城市为依托,防止产业“孤岛化”;产城融合要以园区为纽带,实现城市“专业化”;产城融合要以生态为引领,实现城市“特色化”。

为打造幸福都市提供有力保障

实现城市发展“精明增长”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城市建设者和管理者从社会治理的角

度提供多方位的保障，这在与会专家学者中已经形成共识。

深入实施社会治理创新工程，健全完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互联网以及大数据不仅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也为社会治理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南京市12345政务热线数据分析专项课题组认为，要全面提升大数据意识，深入拓展民生数据汇集分析功能，发挥大数据平台决策支撑能力；共享平台数据，增进公民参与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等，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打造幸福都市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

“以硬权力为特征的单一结构行政权运行模式，能够高速、快捷有效地实现监管目的，但也容易造成滥用行政权力等问题。”镇江市工商局副局长邓国平认为，大数据时代极大改变了市场治理方式，在共治共享理念引领下，以信用约束为核心的协同监管和社会共治将成为市场监管的基本模式，而数据信息采集与运用也将成为实现市场监管目标的重要手段，这要求市场监管中要正确处理好“软行政”与“硬执法”关系。

金融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于促进城市发展“精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南京金融学会会长黄向庆针对我国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发展尚不完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模式容易形成监管真空、金融机构的关联交易容易积累风险隐患、缺乏相关人才和综合金融经营经验等难点，对金融机构如何开展综合金融服务，为城市精明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会议收到论文1200余篇，经评审，评出一等奖10篇，二等奖20篇，三等奖40篇。

（南京市社科联吴伟）

苏南区域专场主题发言专家观点：

城市品位的建构：城市的尊严与市民的尊严 （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所所长 张鸿雁）

城市品位的建设与城市的精明增长，既是一种思想与文化价值取向的建构，也是市民生活方式与行动逻辑的建构。城市品位必须在遵循城市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个体价值，创造具有时代特征的城市品位与“城市文化基因”，进而使城市品位建设成为推动城市精明增长的“文化动力因”，成为“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场域要素。城市品位建设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建构和培育社会样板阶层，还需要具体的行动规划和具体的空间景观文化表现，是一项典型的系统工程：

一、从社会公平到社会公平与正义是城市品位建设的前提和土壤；二、从“社区如家”到“城市如家”是城市品位建构的基础；三、从学习型城市到“哲学型城市”再到“独有的城市哲学”是城市品位的表征；四、从城市精神理念到市民精神的生活实践是建构城市品位的灵魂；五、从生态循环到回归自然是城市品位的终极目标也是发展方式；六、从“城市格调”到“城市时尚”是城市品位建设的“质性”隐喻；七、从生活空间到艺术空间是城市品位的时间切面；八、从大众创业到充分就业再到大众创新是城市品位建设的支点；九、从城市文化资源挖掘到“城市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是城市品味建设的机制。

城市品位是市民社会的整体诉求，城市的创新机制和创新土壤比创新能力更重要。一个城市一旦形成良好的市民社会关系，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行为、新的科学技术和新的思维方式就可以如雨后春笋，创新就有可能成为城市一种

自身内化的机能，有品位的城市一定会聚焦众多的思想家、创新者和新社会文化与新经济思维发展的担当者和推动者。

“新江苏”与南京“四个城市”建设(南京古都学会会长 俞明)

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对于南京来说，就要具体落实到建设“四个城市”“五型经济”的战略中心。所谓“四个城市”是指“一带一路”节点城市、长江经济带门户城市、长江三角洲区域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所谓“五型经济”，即大力发展创新型、服务型、枢纽型、开放型、生态型经济。建设“四个城市”、发展“五型经济”，是符合南京当前发展的现状与宏观经济环境的要求。

江苏科教优势明显，而江苏全省的科技教育优势绝大部分集中在南京。南京在软件开发，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发，科研人才的组织和协作、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密集程度等方面，优势明显，后劲十分强劲，后发亦可占先。

苏州特大城市空间优化和内涵提升对策(苏州科技大学副教授 单鹏飞)

2015年7月，国务院同意批复《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2015~2030年)》，将苏州列为特大城市，苏州由此开启了发展的新征程。在这一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起点上，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苏州发展特点，界定成长坐标，明晰发展定位和重点，制定发展策略，从而全面提升苏州城市节点的地位。

在苏州特大城市的形成和演进过程中，区位优势禀赋是苏州发展的基础支撑；制造业是苏州发展的引擎；开发区是苏州空间扩展的主

要形式；资源配置能力是苏州发展的组织手段；城乡一体化是苏州发展的制度保障。当然，人口的快速集聚亦使特大城市面临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人口拥挤、交通堵塞、就业困难、住房紧张、贫富分化、环境污染、资源紧张等。

结合苏州的资源特色、文化底蕴、优越环境、产业基础和体制优势，苏州特大城市的总体定位应瞄准“东方精致之城”，包括三层含义：以精致为品牌的智造城市，极具东方文化魅力的文化创意城市，世界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为实现此战略目标，具体需从人口规模、产业发展、空间格局、设施支撑、文化引领、住房保障、聚焦太湖等七个方面融合架构苏州特大城市空间优化与内涵提升的建设框架，打造苏州古城、工业园区、高新区、相城、太湖新城、吴江空港“六板块”格局，培育同里水乡文化示范区、太湖休闲文化示范区两大新战略性空间，通过强化政府组织力度、创新政策体系、推进立法建设、深化对外合作和开放、激励多元主体参与等5项举措，推进苏州城市空间优化和内涵提升。

无锡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无锡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苗春阳)

无锡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对接中央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又要结合无锡实际，以增加有效供给、化解过剩产能、防范金融风险、降低企业成本、补齐发展短板等六项重点任务为切入点，改革和建立适应市场要求的资源供给、要素配置方式、配置机制相关的政策，让市场主体在制度及政策框架规范运

作。应突出提升供给侧资源能级，增强供给适应性、灵活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及资本回报、用地产出和潜在增长等效率，形成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优化升级机制。

主要改革路径如下：一是激励科技投入，创新载体功能建设和科技成果转化，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驱动力；二是优化投融资模式，吸收和集聚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促进由物化资本投入为主向知识创新驱动和内生增长的转换，提升投资效率效益；三是改革土地布局、优化供给方式，增强土地经济技术承载强度，建立符合发展要求供地政策，为转型发展、新项目投资提供载体、空间和支撑功能；四是改善人力资源供给模式，优化人力资源市场与人才平台，增强人才支撑驱动力量；五是企业调整优化资源配置，优化生产方式、经营业态、组织模式和管理方式，增强创新活力、创造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常州市出租汽车行业改革路径（常州工学院党委书记 王建明）

出租汽车是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营能力的高低与服务质量的的好坏关系着一个城市的整体形象。常州市出租车行业存在着发展定位、运营体制和政府管制不明确，运乘环境与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诸多问题，而随着网约车的发展，原有的矛盾更加突出，更引发了出租车发展的种种乱象。

常州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应坚持市场化、地方化、智能化与多样化的方向，坚持“问题导向、整体谋划，以人为本、统筹协调，融合创新、规范发展，科学论证、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围绕提高服务质量、规范经营关系、强化市场监管与行业稳定三大核心目标，通过明确改革方向、

完善政策法规、调整运力结构、规范经营权关系、优化经营模式、加强技术应用、强化行政服务水平与监管能力提升，协同其它公共交通构建多样化、品质化、差异化、特色化的出行服务体系，形成规划科学、乘客满意、规范有序、监管有力、和谐稳定的出租汽车行业发展格局，实现出租汽车行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以书香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品位（镇江市文广新局副局长 张志耕）

镇江是山水城市，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我们要立足“生态领先，特色发展”战略，加强全民阅读，放大文化效应，弘扬传承镇江优秀传统文化，增强镇江全市人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镇江市推进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也迫切需要通过开展全民阅读，以文化的力量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文明，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协调发展，通过打造文化强市，提升城市品位。

2014年，镇江市被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确定为书香城市建设试点地区。镇江市委、市政府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书香镇江建设的意见》，把开展全民阅读、建设书香镇江纳入文明城市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的总体规划，以“美丽镇江，美在书香”为主题，以书香八进计划、“一十百千万”项目等为抓手，实施阅读机制保障、阅读阵地拓展、阅读品牌塑造、阅读推广示范等阅读五项工程，促进全社会形成热爱阅读、崇尚阅读的文化风尚。

互联网和创新驱动江苏智能制造

——“互联网+江苏制造”学术聚焦专场概览

2016年11月23日，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社科联主办，南京邮电大学、江苏现代信息服务业研究基地、江苏省通信学会承办的江苏省社科界第十届学术大会“互联网+江苏制造”学术聚焦专场在南京邮电大学举行。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徐之顺、南京邮电大学副校长颜晓红出席开幕式。来自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省社科联、省内部分高校、通信企业以及南京邮电大学师生近百人参加会议。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闫浩副巡视员、中国联通智能制造产品孵化基地王延红总经理、南京邮电大学管理学院黄卫东院长、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张晓东副会长先后就“《中国制造2025》与江苏产业经济”“‘连接+集成’驱动智能制造创新升级”“互联网+制造业”和“智造未来”等议题作了主题演讲。徐之顺指出，在互联网推动电子商务和网络营销飞速发展的时代，中国制造业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利用互联网提高品牌知名度、拓宽销售流通渠道、跟进客户服务，推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已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颜晓红表示，互联网+制造是指通过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实现中国制造2025。江苏是制造业大省，“智能制造”是江苏省实现制造业大省向制造业强省跨越的主攻方向。

世界制造看中国，中国制造看江苏

有学者指出，2014年中国制造业规模占全世界工业生产比重高达22%，成为最大的工业国

家。据联合国对现代工业体系的分类，其包括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按照工业体系完整度来算，中国已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它预示着中国智能制造的发展将直接影响世界制造业的格局。

闫浩指出，发达国家在重新审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制造业和服务业、制造与研发环节三组关系后，通过工业4.0、工业互联网等一系列计划来引导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归。中国要建设制造强国的任务艰巨而紧迫，一是自主创新能力比较弱，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高端装备制造对外依存度比较高。二是产品档次不高，缺乏世界知名品牌和较有影响力的跨国企业。三是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较低，环境污染问题较为突出。四是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密集型的产品比重过大，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生产型服务业发展滞后。五是信息化水平不高，与工业化融合深度不够。六是产业全球化经营能力不足，企业“走出去”仍处于初级阶段。在此背景下，2015年5月8日，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进制造业强国的战略，这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极具指导意义。

江苏是制造业大省，在工信部发布的全国重点发展的150个制造业细分领域中，江苏有92个领域排全国前5，这充分体现了江苏的制造优势，此外，江苏的工程机械，电子装备，芯片制

造，芯片设计和封装测试等方面也具备较好的基础。在智能制造方面，江苏一方面按照工信部要求全方位推进，另一方面，实施了示范智能车间项目。江苏通过申报《中国制造2025》苏南城市群试点示范，探索区域协同创新、产业错位发展、产业链分工协作的新机制、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了一批地标性的先进制造业。在国际合作方面，江苏通过主办世界物联网博览会和世界智能制造大会汇聚智能制造技术、分享智能制造经验、形成有江苏特色的智能制造国际交流平台。

互联与制造的融合引领大数据产业发展

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是制造业和互联网融合的基础，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产品设计、生产流程、产品销售等全过程进行支持，企业通过互联网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在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促进信息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有学者指出，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的特点是全面的连接，包括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连接。企业制造设备通过互联网连接，打造“网+云+端”一体化的信息基础设施，将所有生产环节的数据存储在云端，为整个产业链服务。

有学者表示，利用互联网开放平台与数据资源，加强消费者互动，让消费者参与企业生产、研发、设计、服务，实现个性化、高品质的产品需求，以客户导向实现柔性制造，应用信息技术控制生产模块的精细化管理，创新工艺流程。

南京大学郑称德教授通过分析天猫商城内309家网商的调查数据，从产品创新视角揭示了平台数据分析服务对于网商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平台数据分析服务会通过

促进网商的产品创新性和产品创新速度而提高其经营绩效；平台数据分析服务对网商产品创新的促进作用会受到市场竞争强度和网商经营年数的调节，其中，竞争强度显著减弱平台数据分析服务对网商产品创新速度的支持，网商经营年数则显著增强平台数据分析服务对网商产品创新性的支持作用。

南京邮电大学赵波教授则基于163家物联网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政企、企企、研企协同创新网络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3种协同创新网络均对资源获取和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资源获取具有完全中介效应。

黄卫东强调，互联网不仅提升了产业能力，还改变了产业形态，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互联网与制造业的融合导致生产要素的变化，大量智能工具的产生，包括机器人、高性能计算机、基因技术使得制造过程摆脱了环境、人力、物力和距离的约束，实现智慧制造，通过软件设计控制机器完成“智人”的功能。互联网与制造业的融合导致生产流程的变化，产品的设计需要关注用户需求，互联网产生了大量数据，包括用户行为数据、用户感知数据等，互联网大数据提供了客户兴趣、客户需求 and 客户消费心理，辅助智能设计与研发。

智能制造，前景无限

智能化是未来发展的技术驱动力。近年来出现的量子计算、脑科学、石墨烯、星际旅行、区块链等已经构建了未来的基础。未来是一个无限互联的时代，包括万维网、物联网、云端网乃至生命网。无限互联将引导人类进入全球化的新阶段，包括以贸易国际化为代表的全球化经济，以国际投融资为代表的全球化金

融，以国际化生产为代表的全球化制造以及以旅居国际化为代表的全球化生存。

与会学者表示，无限互联所形成的网状经济具有复制成本趋零的特征，顾客同时为资本，员工同时为客户。分享者、共生者、竞争者多元化，B2B和B2C不再严格区分，C2C、P2P成趋势。传统的大规模生产将过渡到大规模定制，以顾客为中心实现定制化开发、生产和销售，生产要素由资本、劳动力向信息、数据过渡，加速了劳动力、资金和机器等要素的流动和共享，通过工具创新和要素融合提高了生产效率。

“智能制造的本质是基于‘信息物理系统’实现‘智能工厂’，其核心是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动态配置的生产方式，以解决能源消费等社会问题。”张晓东表示，全球互联网制造是一个复杂局系统，它的信息基础设施高度互联，进行实时的控制反馈，具有交互和自学习功能。智能制造将从产品、装备、生产方式、服务和管理等五方面改造传统制造业。全球互联制造从管理视角提出了智能制造的实现路径，描绘了智能制造的美好愿景，是对江苏智能制造产业发展的方向性引领。

与会学者还围绕江苏智能制造的基础、路径、措施和发展方向展开了热烈地交流与研讨。

(陈立梅、沈超/撰写)

“互联网+江苏制造”学术聚焦主题发言专家观点：

《中国制造2025》与江苏产业经济（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委员会副巡视员 闫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经济取得高速发展。中国要打造成世界工业强国，需要综合考虑全球产业格局、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以及资

源环境的约束。今天，新一代信息技术改变了我国制造业的生产组织方式、物流和产业形态，促使产业形态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

为此，国家在《中国制造2025》中，特别明确了选择重点领域的原则，一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二是能弥补市场失灵的领域；三是优势产业领域；四是有差距但必须大力发展、保证自主可控的必争产业等。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10个重点发展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在这10个重点发展领域中有7个是装备制造，它表明我国未来发展制造业的重点是在装备。为配合《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工信部发布了五个重大工程实施指南、四个战略性领域专项规划和两个重要支撑性行动计划。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把10个重点领域细分为23个优先发展方向，编制了技术路线图，并梳理出15个重点行业，分为69个子领域和150个细分领域。

江苏省的定位是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基地。江苏制造业的优势非常明显，从工业总量来看，增加值、销售、利润、税收都在全国前列。江苏省以智能车间起步推动智能工厂建设，2015年授牌150家省级智能车间，累计技改投入223.2亿，采用工业机器人3000多台，实现了一线人员减少20%，产出提高5%。可以说，江苏省智能制造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如何将制造业与高科技企业和互联网企业融合，培养更多本土的创新型制造企业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以理论创新服务于江苏智能制造（江苏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徐之顺）

互联网+代表一种全新的经济社会形式，其核心要义是通过互联网把经济社会中的一些资源

重新进行优化配置和集成，以期推动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变革。在此基础上推动社会形态的变革，形成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社会发展新形态。

江苏是制造业大省，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8，如何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国家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实现由制造业大省向制造业强省的新跨越，是江苏决胜全面小康、建设创新型省份、实现经济社会率先发展的历史性任务。近年来，江苏省采取系列措施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一是加快产业技术创新，实现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的突破。二是主攻具有条件，最具优势的领域，做强产业创新中心，包括纳米材料、软件信息、物联网、石墨烯和生物制药等重点领域。三是实施互联网提升计划，实现产品的智能化，生产的智能化和管理的智能化。

实现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发展，既是江苏实践崛起的目标，也是江苏社科界矢志研究的重大课题。江苏社科理论界多角度全方位探讨互联网经济发展，推出一批有良好社会效应的重大成果。但实践无止境，理论探讨也不能停步。江苏社科界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努力增强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结合新江苏建设的实际，切实加强互联网经济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连接+集成’驱动智能制造创新升级（中国联通智能制造产品孵化基地总经理 王延红）

中国联通根据细分行业建设了若干产业基地，江苏制造业体量大而全，中国联通智能制造产品孵化基地立足于江苏，服务全国，将先

进的工业技术，切入到整个生产制造流程过程中，提供成熟的产品和解决方案。通信运营商的优势是无线、有限智能网络、系统集成和软硬件开发定制，通过网络智能化改造支撑智能制造，将基于人的连接方式（如电话、微信）等拓展为物与人、物与物的链接，建设云网一体化的信息基础设施。随着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企业制造过程中的设备互联互通，产生大量的生产数据，运营商通过整合数据为制造业提供增值服务。当制造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不仅是一个工厂或车间的制造创新，而是整个产业链的革新，通过智能制造产品孵化基地的载体来驱动。

在智能制造体系中，运营商可通过提供连接来改造制造过程。一是通过设备智能连接、内部网互联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二是通过网络协同化生产，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使制造更加智能。三是个性化与服务化的延伸，实现虚实结合，如生产过程实体化，销售过程虚拟化，虚拟互联网向制造业落地是一个互相结合的过程。总之，中国制造业智能化是一个大的机遇，它需要社会各方整体的合作实现共赢。

互联网+制造业（南京邮电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黄卫东）

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解决了生产效率的问题，进入信息社会后计算机代替了人脑，人的工作由产品制造转向产品设计与研发，信息服务的产业规模越来越大，使得制造业的研发、产品的需求和客户体验变得更强。

互联网首先是一个智慧的工具，电脑芯片嵌入到任何物体，物体就变成智能的物体，智

能物体的使用形成移动互联。随着脑科学的发展,可以通过智能硬件控制机器进行远程或异地(特殊环境)工业作业,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实现人脑远程控制,跨越了身体的障碍。网络社会变成现实社会重要的一环,带来了创新的思维,例如通过文章引用查找学术焦点,通过专利图谱发现产业方向。同时,互联网颠覆了帕累托法则,使用户聚集的边际成本为零,客户聚集的价值在互联网中放大,精准营销将带来巨大利益。

互联网和产业融合使我们更加关注客户需求。正如智能穿戴设备产生大量的客户数据,进而支撑客户需求分析,通过对消费行为、心理、取向的整合,进行产品的制造和研发,从而产生巨大的效益。大数据是个性化产品制造的基础。

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后,工厂从最早的关注产品制造到关注产品的生产,变成了以人中心,以完整的信息为系统,实现个性化、多模态,以及多样性的柔性产品,实现制造业的4.0升级。智能机器与人协同生产,协同工作,协同创新。总之,互联网+制造创造了大量的服务业机会,也创造了大量创新创业的机会,机遇的把握需要我们一起努力。

智造未来(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张晓东)

未来制造的重要特征是全球互联智能制造,这是由现代产业的困局决定的。中国制造面临转型升级外部压力,主要来自科技变革对创新的要求、制造业自身的变化、全球竞争引发的环境生态压力等三个方面。从内部来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巨大的内在张力,一

是资源的约束;二是产能过剩。这些问题对中国制造业的创新提出了很高要求。

德国提出的工业4.0,美国先进制造计划都是希望通过制造业的创新夺取制造业的战略制高点。今天,制造业正面临着巨大的变革,无论是云端、大数据、物联网,还是量子计算、脑科学都呈现了未来的趋势。要实现突破需要把握全球、互联和智能化这三个关键词。全球互联不仅引发急速瞬变,导致资源的失衡,环境的失衡,技术的失衡,甚至是人心的失衡,全球互联还带来了深度融合,包括经济的融合、产业链的融合、经济体之间的融合,并将朝着无限互联的方向发展。

如果把制造业的未来分两个30年,第一个未来30年的智能化就是机器赋予智能,就是物的智能;第二个30年,是人的物化,最后人和人之间的眼神交流,不仅“暗送秋波”,还能传递“比特信息”,这有赖于生物技术的发展。这是一个全球互联的时代,过去一轮全球化实际上是贸易的国际化。新一轮全球化将是以中国为主的新型经济体来推动的,民间、国家、政府组织共同促进,通过扁平权利架构来推进的全球化。所谓智能制造就是物的人化,包括全面的网络化,下一轮的互联网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变。

总之,智能制造可概括为六个方面涵义:软件定义一切、数据驱动业务、网络无限互联、生产分布云端、组织敏捷智能和风险安全可控。

“四个自信”：国家的发展根基、前进动力

——“四个自信”学术聚焦专场概览

2016年11月26日，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十届学术大会学术聚焦专场在常州大学召开。会议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为聚焦热点。

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常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陈奎庆，江苏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江苏省委宣传部理论处长李扬，常州大学副校长芮国强，常州市社科联主席陈满林，江苏省教育厅社政处长王伟等出席开幕式，百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展开研讨。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长沈壮海，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胡大平，常州大学特聘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淑芹，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张骥教授，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院长林伯海，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方世南，南京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长王永贵，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健教授等先后作了主题演讲。

“四个自信”体现了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

“四个自信”的提出，是新形势下我党所领导的民族大事业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了新境界，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探讨的重大现实课题。

刘德海在致辞中指出，“四个自信”是有机统一，它构成了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完整的信念、信仰体系。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自信”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四个自信”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理论意义和实践要求，努力用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指导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学科建设与时俱进；加强“四个自信”的学理性研究，通过扎实深入的理论研究，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更坚实的学术支撑，重点探讨“四个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如何践行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等。

研讨中“四个自信”的思想体系及其内在联系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认为，道路、理论、制度自信有特定的固定空间和具体历史条件，而文化又深入于人的一切活动，文化自信是支撑“三个自信”的基础，它不仅渗透于“三个自信”之中，而且相互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与会学者强调，“四个自信”归根结底是要树立主流意识形态的自信。“四个自信”体现了主流思想的内核、要素、核心精髓，树立“四个自信”就是要树立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自信，这是我们国家发展的根基，前进的动力，努力的方向，形成共识的基础。

唯物史观是研究文化自信的理论依据

研讨中，学者们围绕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文化自信观？如何坚持文化自信？树立文化自信的根

本目的是什么?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和别人的文化?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专家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早醒的文化自觉、骄傲的文化自视”的民族。文化的重生和振兴是振兴中华的重要条件和任务,是树立全面而理性的文化自信观的基础。

我们要坚持和做到文化自信,首先需要以正确态度看待自己的文化,充分认识中国文化的独特优势和发展前景,正确对待别人的文化,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进文化交流。

与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应当是研究文化自信的理论依据,必须注意把握文化自信的主体性,即人民性;把握文化自信价值属性问题,文化自信回避不了价值的追求和诉求;研究文化自信的辩证性,即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经济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还要注意文化自信的动态性、发展性。

文化自信的时代价值主要表现在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进动力,是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精神保证,是实现我国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是引领多样化思潮和凝聚共识的有力武器,是实现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基础。学者们认为,价值观与文化是包含关系,价值观寓于文化之中。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自信及其核心价值观对社会成员精神和灵魂的主导。

制度自信需要在比较中获得和树立

充分的制度自信有利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学者认为,制度自信是国家得以成长和巩固的精神基础与政治基础,决定着国家的内聚力与竞争力,进而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命运。

国家的进步与发展需要合理的制度,合理的制度一定基于国家对制度的自主选择;基于自主选择的制度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与会学者表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上述基础之

上,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自信是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独特优势,具有活力潜力,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能取得显著制度绩效,获得社会广泛认可,有着强大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能力,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在当前条件下,我们应如何进一步树立和增强制度自信?有学者认为,制度自信需要在比较中获得和树立。应当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对一个国家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等进行单项和整体性方面的认真分析,通过对不同类型制度的适应力、存活力、复杂性、兼容性和自主性的比较,进而获得理性、科学、全面与整体的认知与评价,进而树立并增强制度自信。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我们不能固步自封,不能关起门来搞制度建设,要在继承中、在改革中、在开放中、在创新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菊香)

“四个自信”学术聚焦主题发言专家观点:

文化强国建设新理念(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长、教授 沈壮海)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对大历史中的大逻辑的把握、对处于新起点上的新任务的明确认识,以及我们面临着大趋势中的大课题,文化强国建设的自觉有了新增进。我们要建设的文化强国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其中“八个坚持”是基本的路向和遵循,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坚持以创新为动力、坚持以开放为取向、坚持以内容为核心、坚持以体改是关键、坚持以人才为根本。文化软实力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要素,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以高度自信创造文化新辉煌,要树立

全面而理性的文化自信观。因为我们具有历史资源自信、具有创造能力自信、具有文化道路自信、具有实践基础自信、具备发展能量自信、具备主体素质自信，中国人民有走自己路的历史底蕴和前进定力。

现代性境遇下的文化自信与核心价值观(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王淑芹)

文化是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主体归属属性。在文化的多层次结构体系中，价值观是主导人们是非、善恶、美丑和理想信念的标准，处于深层且具有主导作用，是文化构成的核心要素。价值观与文化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包含关系，价值观寓于文化之中。世上没有脱离文化而存在的价值观，也没有脱离价值观主导的文化。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共同体的思想基础，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维系的精神命脉。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自信及其核心价值观对社会成员精神和灵魂的主导。文化自信不单是我们文化的自我欣赏与传承，也是在国际文化交流、交往中的他信，即我们的文化能够向世界输出并发生影响。尽管说，我国已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以价值为核心内容的精神文化输出及其影响与之还不够匹配，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去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国际化程度，从而实现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的时代价值与正确坚持(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张骥)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和社会公民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进动力，是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精神保证，是实现我国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是引领多样化思潮和凝聚共识的有力武器，是实现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的重要基础。今天我们坚持文化自信，必须深度阐发传统文化内涵和有时代价值的内容，以高度自信的心态提升文化自觉，以创新的方式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进文化交流，以文化软实力奠定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总之，我们要通过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比较视野中的制度自信(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林伯海)

制度自信来自于对制度的认知、情感和评价，开放社会中的制度自信生成于对不同制度间的认知和评价比较。提高制度自信要求我们不能固步自封，而要在继承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在继承5000年文明史中，吸收前辈治理国家的制度精华；在改革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问题，在开放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正如高铁成为我们的外交名片那样，它体现了我们的制度自信，即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力量去创新；在创新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这一实践本身就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制度文明，也形成一种崭新的制度，这中间既有西方的元素，又有传统的元素，但更多的是现代的中国人的元素，是带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元素的制度。

文化自信视域下我国意识形态的创新(南京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长、教授 王永贵)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而确立起来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政治原则和行动战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现了创新和发展的伟大跨越，进一步增

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自觉和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四个自信”，是一个相互联系而又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将文化自信与“三个自信”有机统一，既体现对文化自信的高度重视，又进一步拓展了“三个自信”的广度和深度。总之，“四个自信”增强了我们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自信和自觉。

爱国是文化自信的前提和表现（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胡大平）

“四个自信”归根结底是中华民族自豪感，是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简单地说，就是爱国。爱国主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而尊重制度、生活方式、法治和相互尊重是其具体表现。文化作为灵魂和根子，是贯穿在理论、制度和道路之中的激情、创造和精神的凝结，反过来，它又是我们不断创造的持久的内在动力。反观中华历史，我们正是在这种辩证关系中，不断拓展和深化自己，从而创造辉煌文明成就的。就此而言，如果没有对自己理念的自信心、对自己制度的自豪感、对民族正在从事的伟大的自觉性、对同胞的信任和认同，文化自信就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今天文化自信成为热点问题是源自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因为，文化不是抽象的理念，它凝聚在人们的感受之中，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和决心。

利益协调、价值共识与文化自信（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方世南）

建立文化自信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是培植价值共识的精神家园，价值认同和价值共识表现出文化自信的本质诉求，文化自信必须建立在以价值认同为前提和基础的价值共识的理

性认识基础上。

今天，面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和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我们必须以共享发展理念来构建共同富裕的利益协调机制，培育和形成反映社会各阶层利益最大社会公约数的价值共识，打造推动全民共同奋斗的精神家园，从而增强文化自信。总之，文化自信就是对自身文化价值和精神文化资源的充分认同、高度肯定，是国家、民族和政党的一种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精神上的依恋和心理上的归宿。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自信的政治逻辑（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张健）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自觉选择，这一选择既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也有利于促进我国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它是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重要内容。今天，我们党努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完善其所坚持的政治制度，并努力将这种改革与中国的发展和稳定有机结合起来，目的就是要使体制变革和发展既有合理的价值追求，又能从创造发展的角度来完善和提升相应的制度，从而逐渐走出一条以不断提升制度的有效性来增强制度的合法性的制度建设和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既体现了我们对原有制度的坚持、维护与改革创新统一，更激发了我国政治制度的潜能，从而不断提升其制度的有效性，增强其合法性。